

DAWN WATCH IN CHINA

在中国看到曙光

【美】乔伊·霍默 著
韩瑞国 韩 阳 刘 玥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在中国看到曙光

(美) 乔伊·霍默 著

韩瑞国 韩阳 刘玥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中国看到曙光 / (美) 乔伊·霍默著; 韩瑞国, 韩阳, 刘玥译.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033-2622-6

I. ①在… II. ①乔… ②韩… ③韩… ④刘…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3781号

在中国看到曙光

著 者: (美) 乔伊·霍默

译 者: 韩瑞国 韩 阳 刘 玥

责任编辑: 王大亮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装帧设计: 李 戎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ch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科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277千字

印 张: 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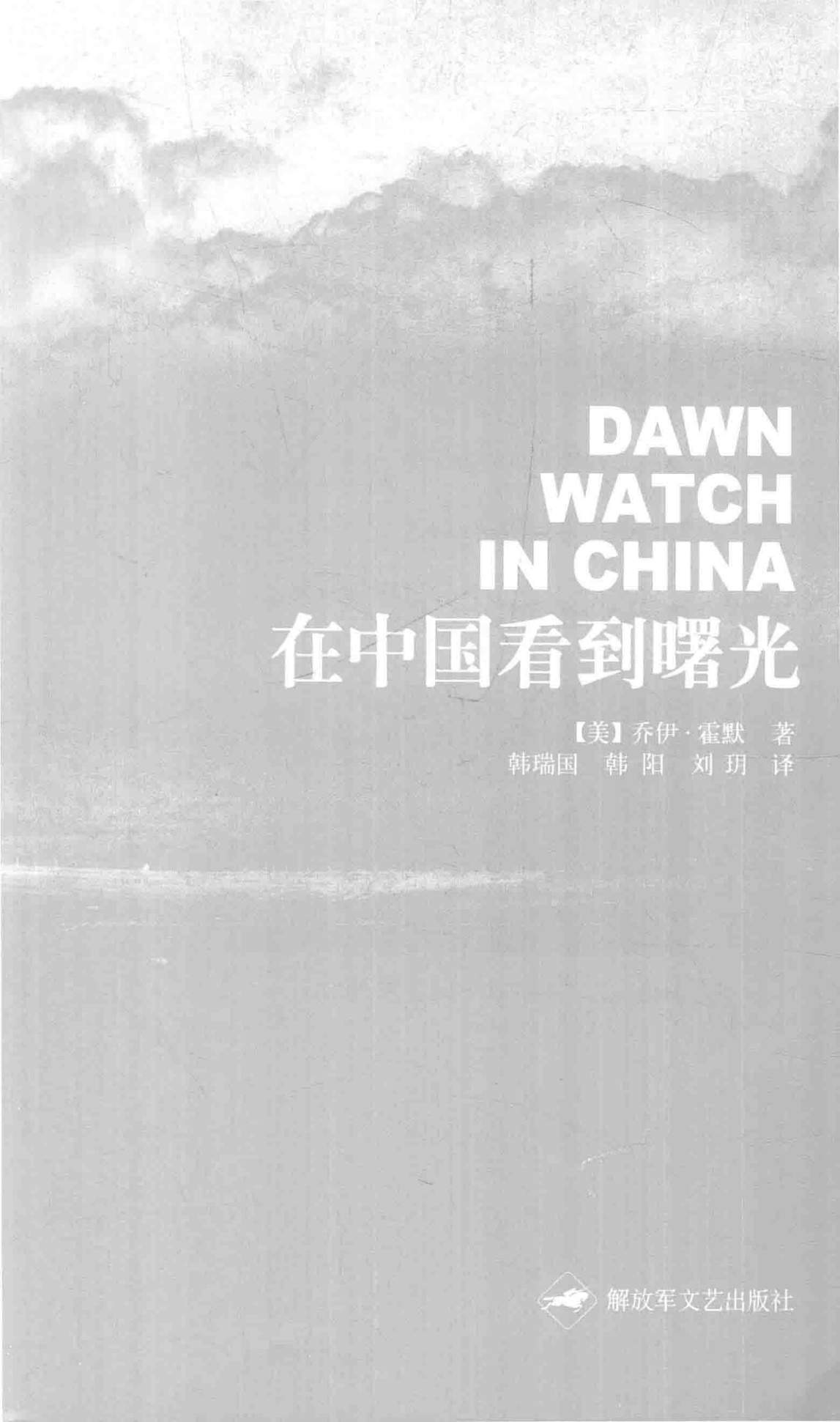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33-2622-6

定 价: 33.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DAWN WATCH IN CHINA

在中国看到曙光

【美】乔伊·霍默 著
韩瑞国 韩 阳 刘 玥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作者乔伊·霍默(1915—1946)

Joy Homer

乔伊·霍默是西德尼·霍默与路易丝·霍默的女儿。西德尼与路易丝共生五个女儿，乔伊行二。1938年10月，23岁的乔伊作为美国各教派教会对华救济委员会的记者被派往中国，考察中国抗战情况，在美国报刊发表中国抗战的新闻、故事和照片，以筹集救济款。乔伊到中国后，在芜湖弋矶山医院院长罗伯特·布朗博士的陪同下，历时14个月，深入国统区和解放区，深入抗战前线，采访了蒋介石、毛泽东等国共两党多位领导人及国民党军和八路军众多将士，在桂林、重庆、郑州等城市亲历过日本空军的大轰炸，用相机拍下了一幅又一幅侵华日军残杀中国人民的血腥场景。

1939年初，乔伊在重庆巧识杜庭修。杜庭修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著名音乐家、作曲家，中国最早留美专修音乐的学生之一，在美国举办过个人专场音乐会，是乔伊父母的老朋友。因为父母的关系，乔伊与杜庭修相识后很快便建立起友谊，可不久杜庭修便因病去世了。离世前杜庭修多次要求乔伊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从而促使乔伊1939年底返回美国后不久便开始写作《在中国看到曙光》，并于1941年由美国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了英文初版。

乔伊来中国前夕，在纽约认识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编辑威廉·德夫林格，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坠入情网。乔伊来中国11个月后，德夫林格辞掉了工作，于1939年8月底来到战乱中的中国，与乔伊在上海重逢。此后的三个多月里，两人一起在中国各地采访。

1940年，乔伊与德夫林格在纽约举行了婚礼，一年后乔伊生下女儿凯瑟琳。然而正如中国民间俗语所说，红颜薄命，乔伊于1946年病逝，年仅31岁。乔伊去世后，她的女儿由她的姐姐安妮·霍默抚养。安妮是20世纪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在《好管家》《妇女家庭杂志》《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发表短篇小说100多篇。她还为她母亲写了一部名为《路易丝·霍默与歌剧的黄金时代》的传记。后来，安妮嫁给了她的妹夫德夫林格，两人养育了四个儿子。



作者父亲西德尼·霍默（1864—1953），20世纪美国著名音乐家、古典作曲家。



作者母亲路易丝·霍默（1871—1947），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女低音歌唱家，被誉为世界歌
剧史上最伟大的女低音歌唱家之一。



陪同作者到中国各地采访的“采访队队长”——芜湖弋矶山医院院长罗伯特·布朗（1886—1948）博士。

TO MY HUSBAND

献给我的丈夫

目 录

1	第 1 章	穿过封锁，进入中国
39	第 2 章	战火纷飞的南方
64	第 3 章	重庆繁荣的日子
80	第 4 章	顺长江而下
101	第 5 章	大学西迁
117	第 6 章	北上之路
139	第 7 章	陇海线上
156	第 8 章	合作社
167	第 9 章	游击队的客人
196	第 10 章	共产主义者
219	第 11 章	炸弹、新生和猩红热
229	第 12 章	重庆大轰炸
249	第 13 章	日占区
262	第 14 章	洪 灾！
290	第 15 章	特殊使命

第1章 穿过封锁，进入中国

我身旁的孙先生喃喃地说：“你肯定看到了那些漆黑的物体，离海边很近。咚、咚、咚……就在左边。很遗憾，那是水雷。”

我从船舷向外张望，是水雷，我也深感遗憾。

“上周就有三条船报销了。”孙先生高兴地说。

我们一时无言，看着我们的船艏缓缓驶向雷区。宽阔而平静的瓯江口，在阳光下显得十分美丽。这里的平静颇有讽刺意味。江口以外的陆上是什么样子，我一时无法猜想，因为光秃秃的褐色山峰，静静的江水，看不出前头有任何恐怖或美丽的迹象。我们后边，一队有着高高船艏的平底渔船忽隐忽现，驶入内陆航道的风中。我们的右边，一座村落紧贴在肉桂色的山崖上，村里的瞭望塔立在山头上。沿着江口逆流而上几英里，有一座有着灰色城墙的小城，那是中国沿海港口之一的温州。清代以前，人们把这座城叫作“鹿城”，因为一只白鹿曾来到这里的城门，嘴里含着花朵。

这是我进入未沦陷区的第一站。

三年的梦想终于成真，我终于迎来了这一时刻。三年来，我私下里一直刻苦用功，学习中国历史与背景知识，我知道，我一定会去那里。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例如，中国就需要金

钱，需要新闻。

中国一直是我的最爱。过去三年里，从远东回来的旅行者给我带来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逐渐得到巩固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这个故事始于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最深厚的根基一时被连根拔起，国家的精神生活陷入混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治剧变，还有文化上的颠覆：随之而来的是青年一代对这个国家过于世故圆滑的文化的反叛。留学生们从现在非常时兴的“外国”大学回到国内，满脑子都是易卜生、马克思与托尔斯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们不加区别地推翻了自己神圣的教育体制：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社会家庭传统被付之一炬，以中国古代保守文化为根基建构的官僚体制也随之而逝。在惊恐万状的老者面前，学生们炫耀着西化的服饰和婚姻制度。

渐渐地，陌生的西方模式被转变为更具建设性的渠道。在蒋介石委员长及其夫人的领导下，我们对民主治理与社会改革怀有的最广泛的理想开始在东方得到具体的表现。首先是纠正以往的错误，逐渐取缔压榨与贿赂行为，逐渐淘汰腐败的官员，吸食鸦片者立刻被送进诊所，鸦片贩子则被交给刽子手。旧中国已经腐烂的核心不可能在一天甚至十年之内得到彻底根除，但清扫行动却在进行之中。

其次，更具建设性的计划也付诸实施。新的学校与大学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兴起，其中许多为教会创办。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部分，政府提供贷款成立农民信用社。对工人阶层提供大众教育已经成为规定而不是例外。现代医学计划打响了针对迷信和古老中医传统的战斗。在蒋夫人宋美龄的倡导下，“新生活运动”开始把西方的卫生及健康方式教给民众，对农业与畜牧业、接种、教育进行改进，在富人中推广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所有

这些都是中国人急需的，而且非常不愿意接受的。首都南京成为改革与复兴的滥觞。这块土地上涌现的新精神让全国的年轻人热血沸腾，他们愿意做出任何牺牲。

所有这些事情，都隐藏在不起眼的文章和传教士的报告里，隐藏在我的朋友们所讲的故事里。报纸上当然会报道蒋介石遭到绑架及其被迫与共产党合作的消息，报道人民对日本入侵与日俱增的愤怒情绪。抗日战争爆发后，报刊相应的专栏充满了关于伟大的上海保卫战的报道。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新闻都是军事报道，越来越血腥，也越来越琐碎。

几个月过去了，现在，连不起眼的文章也不再描写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任何人都不了解。

显然，中国仍然还在大后方苦苦地拼搏着。但如何拼搏？那些跟政府去了西部的学生怎么样了？是否仍然存在“新生活运动”这样的事情？新的医学标准是什么？民众大规模的西迁对尚处于落后阶段的中国西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战争是否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他们现在对日态度是否到了无法控制的敌对地步？他们刚刚找到的强化自我与强化国家的决心是不是成了战争的首要牺牲品？

答案全然不知，而找到这些答案似乎只有一种办法。

我去了中国。

最终启程毕竟没有曾经预计的那样容易。在纽约停留的最后三周里，一位名叫比尔的先生（现在碰巧做了我的丈夫）突然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给我带来快乐。然而，我已经接受了去中国的工作，旅程票已经买好，工作必须完成。于是，1938年10月，就在我乘船驶入温州港的前两个月，美国各教派教会对华救济委员会派我作为新闻记者前往远东，获取准确的新闻，然后在美国发表系列文章、故事以及照片，以这种形式筹集救济款。

我停靠的第一站是上海，却发现那里的人们对西部普遍发生的巨大变化全然无知，甚至似乎也不在乎。我从各方得到的消息都是些概括性描述。是的，没错，大学全都搬到成都等地去了——了不起的大迁徙，不是吗？当然，他们听说过工业合作社^①，但这些东西或者类似的东西到底有多少，他们并不知道。没错，西部的士气应该还是不错的，但一切都可能是瞎说。近来中国的报道与日本报道一样，无法让人相信。粮食供应情况如何？见鬼，他们怎么会知道？

在上海的三天时间里，我累死累活地奔波，查看战争废墟，走访麻风病人与难民营，看到死在街头的儿童，除此之外却一无所获。上海的困难是一个古老而悲惨的故事，而具有建设性的新闻却隐藏在内地，在西部。在那里，中国政府正在为生存而战。

第三天，才华出众的杰出传教士查尔斯·博因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霍默小姐，您可能想见布朗^②医生。他刚刚从芜湖回来。他在那里的医院做总监，正打算进入中国国民党管辖区。您在找一条新的路线是吗，罗伯特？”

博因顿先生眼睛一亮，带着一丝狡黠，无须任何解释。我庄重地与意外相会的罗伯特·布朗先生握手。他肩膀宽大，腰板直挺，具有军人风度和将军一样的干练与直率，根本不像一位教会

① 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互助组织。1937年11月，上海工部局工业科长、新西兰人艾黎（1897—1987）建议，以合作社方式在大后方进行工业生产，以供战时军需民用，得到各界积极响应。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任技术顾问。此后，在西北、西南各地建立了大批小型的工业合作社，遍及纺织、机械、化工、武器等行业，生产出大量军工民用产品，对支援抗战、活跃后方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书中脚注皆为译者所加。

② 罗伯特·布朗（1886—1948），美国美以美会（卫理公会教会之一）传教士、医学博士、公共卫生学硕士，受美以美会派遣，于1914年来中国，出任芜湖弋矶山医院（美以美会创办）院长。布朗先后于1914—1928年、1930—1937年任弋矶山医院院长。

医生。

“真的是一条新线路？”我轻声问。

“就这场战争而言是新的，”布朗医生说，“至少从来没人试过。”他竭力保持低调，不是那么信心十足。

“到哪里？”

“布朗医生将带领部分救援医生到中国大后方的南昌医院，”博因顿解释说，“然后……”

“无人知道——”布朗医生几乎望眼欲穿，“这段路程至少需要三个月。”

该我出击了。

“那么我呢？”我含糊其词地问。

“是呀，”博因顿带着怨气说，“带上她吧。教她点门道，她写东西需要材料。”

布朗医生瞪了我们片刻，一脸惊恐的神色。后来，幽默战胜了更为敏锐的判断，他咧嘴一笑，这回是善意的笑。

“为什么不呢？”他说。

事情这么快就定下了。

第二天，我们就对着地图开始磋商，俨然像两位谋划战争的将军。我们决定，不走法属印度支那^①铁路到昆明——那是条人们常走的迂回路线，而是通过温州小港直接进入中国腹地。温州在上海以南大约500英里，属于中国的浙江省，这时还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但已被日本军队公开封锁，温州港已被布上了水雷。有传言说，沿海的小船和平底船正一成不变地偷偷穿越布雷区，与这座小城继续开展富有活力但却理应受到禁止的贸易。从温州到金华有长途汽车，而从金华可以乘坐火车直接到达内地的南

^① 法属印度支那是法兰西东南亚殖民地的一部分，实行联邦制，其组成包括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首府位于河内。